

近代日本外交研究

● 俞辛焞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日本外交研究/俞辛焯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6.5

ISBN 7 - 80696 - 244 - 1

I . 近... II . 俞... III . 外交史—研究—日本—近代 IV . D83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6925 号

近代日本外交研究

俞辛焯/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 tjgicbs@yahoo.com.cn

唐山市三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5 字数 380000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 - 80696 - 244 - 1

定 价: 2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外交史论	
——史观·方法·理论·····	(1)
第一节 辛亥革命初期与北京政府的中日外交 ·····	(1)
一、辛亥革命的爆发·····	(2)
二、袁世凯与南北议和·····	(4)
三、南京临时政府·····	(8)
四、日本对满蒙政策的形成·····	(13)
五、北京政府的建立·····	(15)
第二节 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时期的中日外交 ·····	(20)
一、孙中山访日·····	(20)
二、二次革命时期·····	(25)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	(30)
四、洪宪帝制·····	(40)
第二章 二十世纪孙中山对日关系的外交 ·····	(48)
第一节 旅日华侨在孙中山与日本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	(48)
一、辛亥革命前·····	(48)
二、辛亥革命后·····	(59)
第二节 孙中山对“满洲租借”的考释与态度 ·····	(71)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状况·····	(71)
二、对2月5日函的考释·····	(73)
三、对2月8日函的考释·····	(76)
四、对“满洲租借”的态度·····	(79)

第三节 孙中山对《中日盟约》问题的辨析·····	(83)
一、《中日盟约》·····	(84)
二、致小池张造与《盟约案》·····	(92)
第四节 孙中山的反帝斗争与列强的对策 ——以关余、商团事件为中心·····	(95)
一、争取关余的斗争·····	(95)
二、平息商团叛乱·····	(102)
三、反帝策略与斗争的性质·····	(107)
第三章 黄兴与日本关系中的外交·····	(111)
第一节 黄兴与日本关系绪论·····	(111)
一、同盟会成立时期·····	(112)
二、辛亥革命时期·····	(124)
第二节 二次革命时期黄兴对日的政策与活动·····	(128)
一、1913年4—7月对日政策·····	(129)
二、1913年3月—1914年6月在日活动·····	(137)
第三节 护国运动时期黄兴与日本的关系 ——兼论孙中山、黄兴对日战略的异同·····	(143)
一、黄兴与孙中山对日“二十一条”的异同·····	(144)
二、5—6月黄兴的对日政策·····	(149)
三、孙中山与黄兴对日战略的异同·····	(155)
第四章 二十年代中国与日本的外交·····	(159)
第一节 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	(159)
一、日本与欧美对山东的外交·····	(159)
二、北洋政府对山东的外交·····	(165)
三、新时代——五四运动·····	(171)
第二节 吉野作造与五四运动·····	(174)
一、对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174)
二、民本主义与人道主义·····	(181)
第三节 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	(186)
一、第一次直奉战争·····	(186)

二、第二次直奉战争	(192)
第四节 日本东方会议真相与《田中奏折》	(200)
一、东方会议	(201)
二、《对华政策纲领》	(211)
第五章 “九一八”事变前后中日外交	(214)
第一节 事变时期蒋张的不抵抗主义	(214)
一、抛砖五个问题	(214)
二、初期的相似之处	(218)
三、对锦州战略的异同	(224)
第二节 币原对事变的外交	(233)
一、事变爆发后的对策	(234)
二、对国联的活动	(242)
三、对齐齐哈尔的外交	(252)
四、对锦州的外交	(261)
第三节 伪满的殖民地与日本外交	(267)
一、伪满与政权	(267)
二、伪满与殖民体制	(274)
三、伪满外交与日本外务省	(279)
第四节 “满洲国问题”与日本的战时外交	(288)
一、中日战争时期	(288)
二、日美谈判时期	(296)
三、“终战”时期	(301)
第六章 抗日时期日本对中国的策略与战略	(307)
第一节 国共摩擦与日本的策略	(307)
一、对华北国共党的摩擦	(307)
二、对山西的策略	(313)
三、对陕甘宁的战略	(316)
第二节 日本对华北根据地的军事扫荡	(318)
一、对晋察冀根据地的扫荡	(318)
二、百团大战与第二次扫荡	(321)

三、“总力战”与围剿	(327)
四、扫荡与退却	(332)
五、经济封锁与思想围剿	(335)
第三节 侵华战争时期日军的化学毒气战	(341)
一、化学毒气的生产与使用	(343)
二、抗战时期的化学毒气战	(345)
第七章 抗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时期国际外交	(354)
第一节 太平洋战争前夕的日美外交	(354)
一、日本南进与美国的绥靖政策	(354)
二、日美对远东的慕尼黑阴谋	(362)
三、美国对远东和太平洋的全球战略	(366)
第二节 战争论与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	(369)
一、战争论	(369)
二、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380)
第八章 二战后对日本的改革与政策的转变	(387)
第一节 战后改革	(387)
一、宪法、政治、经济等改革	(387)
二、改革的动力与领导	(398)
第二节 占领政策转变与否辨析	(409)
一、衡量转变的标准	(409)
二、占领政策的转变	(411)
三、在转变中的不变	(416)
后记	(424)

第一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外交史论

——史观·方法·理论

第一节 辛亥革命初期与北京政府的中日外交

在辛亥革命中,中国革命势力打倒了封建主义清王朝,并试图建立共和制民国。这次革命纯属中国的内政问题,应由中国人民和革命势力自主进行。然而这次革命竟演变为国际问题,日本和欧美列强均欲对其进行直接或间接干涉。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属于日本和欧美列强的半殖民地,并非完全独立的国家。在中国各地都存在着列强的殖民利益。辛亥革命的爆发,威胁了日本和欧美列强的既得利益。同时,革命造成中国国内暂时的动乱,给日本与欧美列强扩大既得殖民利益以可乘良机。因此,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和欧美列强最关心的是维护其在华的既得利益和扩大新利益,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它贯穿始终。但是辛亥革命前期,相对以维护既得利益为主,而后期则以扩大新利益为主。

既得利益的维持与新权益的扩大,成为辛亥革命时期国际关系的焦点。清政府、南方革命军以及日本与欧美列强,都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外交活动。

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外交也围绕上述问题而展开。中国与欧美列强、日本与欧美列强之间的外交,是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展开的。这是因为在对待辛亥革命的问题上,中国、日本与欧美列强之间的外交关系具有二重性格。日本与欧美列强在维持既得利益方面采取了一致合作的外交政策,但是在新权益的扩大上又互相争夺,互相牵制。中国与列强之间是被侵略与侵略的关系,日本与欧美列强在侵略中国的问题上存在着矛盾与对立。中国充分抓住这些矛盾与对立,有时利用欧美列强牵制日本,有时利用日本牵制欧美列强。相反地,日本有时趁中国与

欧美列强之间的对立激化之机,利用中国牵制欧美列强;而欧美列强也会趁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对立激化之机,利用中国对抗、牵制日本。这就是在辛亥革命问题上的二重国际关系。中国与日本的外交也在这种二重关系框架之内进行。因此,这种二重外交论成为研究该时期中日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体系。

在这种二重的复杂中日外交与国际关系之中,中国并非一个整体,而是南北对立之势。辛亥革命前期,是北方的清政府与南方的革命军及军政府,后期是以袁世凯为中心的北京政府与以孙中山为中心的南方革命党势力产生对立。因此,在对待南北势力的态度上,中日外交与欧美列强之间的国际关系也成一种对立的国际关系。围绕辛亥革命,中日外交与国际关系更趋复杂,这是过去的中日外交与国际关系所没有的新现象。

本节以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与国际关系的上述环境与基本理论为前提,探讨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出山、南北和议、南京临时政府与北京政府时期的中日外交以及该时期日本的满蒙政策。

一、辛亥革命的爆发

辛亥革命时期的最大问题是日本与欧美列强对待革命是否像对待义和团运动那样进行武力干涉。革命首先以武昌、汉口、汉阳为中心展开。该地区是中国贸易集散地,汉口设有5国租界与11国领事馆,有数千外国人居住在那里,也是日本与欧美列强的权益集中之地。因此,是否出兵干涉,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被提及。日本与欧美列强从清政府攫取殖民权益,而清政府则以革命危及列强权益为由而希望列强武力干涉,并要求财政与军事支援。但是与清政府对立的革命军和军政府为达到推翻清朝的目的,竭力阻止日本与欧美列强的武力干涉,这成为革命外交的最大课题。为此,他们宣布保护列强的在华权益,承认既成的不平等条约等。互相对立的清王朝与革命军均采取了相同的外交手段——保护欧美列强的既得利益,以达到消灭对手的目的。日本与欧美列强是否出兵干涉,对辛亥革命能否成功起着巨大的决定性作用。

那么,日本与欧美列强在出兵干涉问题上持何种态度呢?驻武昌、

汉口的领事没有答应清政府武力干涉的要求,而是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其原因主要有:(1)他们对辛亥革命的政治目的有一定的了解,认为这次革命不同于义和团运动;(2)革命军保护列强的既得利益与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秩序井然地向前推进革命。这个时期,革命军并不希望列强支持革命(孙中山除外),而只是希望他们采取中立态度。日本与欧美列强的领事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认为与其对革命进行干涉,还不如保持中立更有利于既得利益的维护,于是他们表明了中立的态度。但是,汉口领事团内部并非一开始就达成一致意见。日本与德国的领事表明了干涉的态度,然而最后仍不得不遵从列强协调一致的原则而采取中立态度。

列强对革命的中立政策仅限于武昌、汉口等局部地区,但是由于革命波及到全国各地,独立后的各地军政府也同湖北军政府一样,宣布保护列强的既得利益,所以列强的中立政策扩展为对辛亥革命整体的外交政策。

但是,日本与欧美列强以保护既得利益为借口,向中国沿岸及长江流域增派军舰与军队,这虽并非欲直接干涉革命(日本除外),但是客观上给革命军及其政权施加了政治、军事压力,给南北政权以及孙、袁妥协带来了影响。这是对列强的误解,在过去中国学者的辛亥革命研究方面,总是过于强调列强所谓的武力干涉。

列强对辛亥革命的中立政策是出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而采取的共同一致的行动,反映了列强对华协调外交的一个侧面。而对华外交的另一个侧面——列强之间的互相争夺也在协调一致的中立政策背后悄悄进行。争夺是围绕新权益的扩大而展开的。

辛亥革命时期,试图扩大新权益的国家是日本与沙俄,而主张积极出兵干涉的首推日本。陆军在制定日本大陆政策方面起决定性作用。在一年之前,陆军就预测到中国可能会出现“叛乱”,并讨论了对其进行军事干涉的对策。因此,辛亥革命爆发的同时,陆军首先主张出兵干涉,并开始为出兵做必要的准备调查工作。外务省与陆军步调一致,向清政府提供武器,开始着手支援清政府。支持清朝廷军队镇压革命军就意味着反对革命,但是与此政治意义相比,他们更希望支持清政府来

获取更多权益。10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制定了对辛亥革命的外交方针,明确表示了日本在满洲与中国本土扩大新权益的野心。

日本政府、外务省与军部在维持、扩大在华权益的最终目标上是一致的,但是达成此目的的手段却不尽相同。参谋本部秘密向革命军提供军需品,海军则对出兵干涉持慎重态度。陆军出兵干涉的主张并没有上升为日本的国策,但中国的革命势力与欧美列强始终对此心存戒备,并表现出牵制的姿态。

以日本陆军为首的出兵干涉主张并没有得以实现,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日本国内,海军采取了慎重的态度,政府与外务省也重视与欧美列强的协调外交。(2)日本的伙伴俄国准备出兵干涉,日本也准备与俄国联合行动,但是由于俄国与德国之间的对立激化,俄国采取了日本先出兵,俄国才能出兵的姿态,放弃了与日本进行共同行动的方针。(3)欧美列强对辛亥革命的性质有一定的了解,并且由于此时欧洲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对立激化,第一次世界大战迫近,无法顾及对中国的出兵干涉。(4)因此,欧美列强利用列强间协调一致的原则,牵制妄图单独出兵的日本。(5)英国等欧美列强的在华权益主要集中在革命军管辖之下的南方地区,为保护他们的权益,他们并不想出兵与革命军作对,而且牵制日本出兵干涉。(6)南方革命势力迅速发展壮大,形成与清政府鼎立之势,中国的政局变得越来越不明朗,因此日本迟迟下出出兵干涉的决心。

基于上述原因,陆军出兵干涉的主张没能实现。但是此后占领山海关——奉天间的关外铁路,出兵干涉等主张依然存在。这显示出了军国主义国家的特色。

二、袁世凯与南北议和

到11月,南北各省纷纷宣布独立,革命的声势更加高涨,清政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为化解此次危机,清政府再次起用被驱逐出北京政治舞台的袁世凯,并任命其为内阁总理大臣。袁的复归与英美的暗地支持有密切的关系。袁再度掌握清政府的政治军事大权,摆出一副主宰中国的姿态。日本与欧美列强为维护 and 扩大其在华殖民权

益,便试图抢先将最高统治者拉至自己麾下。于是,日本与欧美列强,特别是英国开始为袁世凯登上北京政治舞台展开了外交争夺。英国要求袁出山,期待他能够收拾中国的动乱政局,而日本则反对袁出山,对其重返政治舞台提高了警惕。此时,袁世凯也期望英国对其进行支持,同时担心日本出兵干涉,对日本抱有疑心,充满戒备。这形成鲜明的对比。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日清、日俄战争以来,日本与英国对华的外交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取代英国成为在华殖民权益最大的国家,成为中国最大的敌国。英国由过去最大的侵略国家变为以维护既得权益为主的国家,对中国的威胁力也渐渐不敌日本。日本与英国在华势力的变化必然影响到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国对日、对英政策不得不发生相应的转变。这反映在袁世凯的对日、对英态度上。日俄战争前,袁世凯向日本靠拢,日俄战争后,向英美积极靠拢,采取“交远制近”的外交政策,与英美联合共同抵抗日本这个最大的侵略国家,于是形成了袁与英美、袁与日本不同的外交关系。在辛亥革命中,这种外交关系得以维持和继续。英国利用袁世凯与日英的这种关系,在围绕辛亥革命的日英之争中,牵制日本,力图排除日本对中国政局的介入与干涉。

日英之间的争夺,在南北停战与议和以及政体选择上更加明显。袁出山之后,首先攻陷了革命军占领的汉口与汉阳,但他没有渡江攻占武昌,仅仅维持了对反击有利的政治军事局势,对南方的革命军与革命政府施加了政治、军事压力,对其进行牵制。但是,同时也承认他们势力的扩张与存在,利用他们的气势向朝廷施加政治压力,甚至逼迫皇帝退位,企图成为君临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为此,从南北停战到议和,从议和到共和制政体的选择,袁世凯积极推进,使之付诸实现,以此来逼迫清帝退位。政体问题是南北对立的焦点,袁为达到其目的,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因此,政体和袁世凯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日本与英国对政体选择的不同反映也就形成了他们对袁世凯的态度。两者互相交织,展开了复杂的外交关系。

在政体选择上,袁世凯表面上主张君主立宪,但背地里却转向共和制。他并非共和主义者,因此并不从内心赞成共和制,而是将其作为逼

迫清帝退位的一个政治手段加以利用。英国最初主张君主立宪制,但后来渐渐向共和制转换。与其说英国赞成共和制,毋宁说他是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采取上述对策的。(1)为保护南方军政府下的英国在华权益,没有公然反对革命派强烈主张的共和制。(2)为早日在中国建立一个坚实的统一政权,英国支持被视为中国“强人”的袁世凯,所以不得不赞成袁世凯主张的共和制。可是日本直至最后仍然固执地赞成君主立宪制。原因在于:(1)日本为君主立宪制国家,以元老为首的政治家坚持君主立宪,打破实力主义的日本外交传统,强硬推行意识形态的外交方针。(2)利用君主立宪保持清廷,并以此来牵制妄图君临中国的袁世凯。日本与英国的对策是对立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显示了两者在中国的争夺,而两者之争也导致了这种对比鲜明的现象。这反映了日本与英国的二重外交关系的一个侧面。

可是,这个时期围绕袁世凯、南北议和、政体问题等而发生的日英之争是在协调的名义下进行的。协调与斗争是对立的。但英国巧妙地利用了日英同盟规定的同盟关系,同日本进行斗争。英国要求同盟国日本协调其对华外交,并且利用协调一致的同盟关系牵制日本单独行动。日本被英国的这种同盟协调一致的方针束缚,对各种问题不得不看英国的脸色行事。这样,英国与日本在协调的名义下,一边寻求两者之间微妙的平衡,一边展开对待辛亥革命的二重外交活动。

袁世凯巧妙地利用上述日英之间的二重外交关系,牵制了企图依赖英国进行无理干涉的日本,同时,英国也利用袁世凯,排除了日本的干涉与介入。相反,日本以坚持君主立宪制为条件,向袁世凯表明支援的意思,试图使袁世凯倒向日本,并对其加以利用。袁虽对日本充满戒心,但是也不能完全无视日本。这是因为,日本在地理上是中国的近邻,是能够出动大批军队进行武力干涉的国家。另外,在政体选择上,也有必要说服日本,排除来自日本的障碍。这样,袁世凯与日本围绕政体选择展开了一场二重外交。

围绕政体问题的南北议和于1911年末决裂,共和制的南京临时政府加快了成立的步伐。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对于袁来说一方面是一个威胁,另一方面又可利用其来逼迫清帝退

位。袁利用这个有利条件首先逼迫清帝退位,然后利用此来攫取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的位子,要求解散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也以清帝退位为条件,答应了袁的要求。这样,袁世凯与孙中山为达到让清帝退位的共同目的,通过梁士诒、唐绍仪和伍廷芳,进行了秘密交涉,开始妥协。

上年末南北议和的中心为政体问题,这次内部交涉的中心为清帝退位的问题。这是南北方最大的共同点,通过共同努力解决政体问题。在此过程中,袁世凯试图一箭双雕,先逼迫清帝退位,后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新政权。孙中山为达到利用袁世凯逼清帝退位的目的,以坚持共和制为条件,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于袁世凯,这即是以袁为中心的袁孙妥协与南北妥协。英国在背后支持妥协,而日本则对此加以反对。这是因为正如日本公使馆武官所言,“若与革命军妥协,则天下将为袁之天下”。日本是南北妥协的最大障碍,也是最有可能以武力进行干涉的因素。袁一面试图说服日本,努力排除其干涉,一面利用英国,牵制日本的干涉。

对于秘密进行的袁孙之间的妥协,中国南北双方均存在着反对的势力。在北方,以铁良与良弼为中心的皇族中坚分子展开倒袁活动,并以此反对南北妥协。在南方,激进的革命党人反对南北妥协,并将矛头指向了袁。南方的日本大陆浪人也反对南北妥协。南北势力在反对妥协、反对袁世凯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最终目的政体问题上却是对立的。对立势力在达到目的的手段上暂时是一致的,但是他们的反袁活动,特别是南方激进革命党人以袁世凯为对象发动的恐怖活动反而给了清朝廷以威胁,加快了其灭亡的步伐。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带来的政治压力,袁世凯的权谋术数,英国对袁的支持、激进的革命党人的恐怖活动、孙中山等人的妥协政策等诸要素,使清帝被迫于2月12日宣读了退位诏书,宣告了清朝的灭亡以及在中国存续了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终结。

袁与孙,南方与北方达到了逼迫清帝退位的共同目的,但接下来围绕着新政权的创建又开始了新的对立。孙中山要求袁世凯南下,强调以南京临时政府为基础组建新政权,但袁世凯则主张以北京为中心在北京建立新政权。从形式上看,好像是新政权首都的选定问题,而本质

上却是新政权的性质及走向的问题。孙中山为让袁南下就任临时大总统做了种种努力。袁于3月初在北京、天津一带策动士兵叛乱,并以北方的不安定为由拒绝南下,孙中山不得不同意袁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这样,袁完全掌握了清帝退位后成立的南北统一的北京政权,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三、南京临时政府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南京临时政府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始于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的对日、对欧美外交。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利用旅外条件,展开了对日与对欧美外交。他的外交活动是在分析、判断日本与欧美列强对辛亥革命态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孙中山认为,日、俄、德三国反对革命,美、法同情革命,而英国的态度不明朗。他向美英法呼吁不要干涉革命、保持中立,并希望他们向革命军提供支援。可是,这些国家并未对革命表明政府态度。他们对北方的袁世凯寄予厚望,而对孙中山与革命军则不屑一顾。孙中山对这三国的期待最终化为泡影,这说明他外交判断上的失误。但是,孙中山在欧美的外交活动并非毫无意义。一国革命不能孤立进行,而争取国际支援是非常必要的。孙中山为获取国际支援所做的努力应予以积极评价。

孙中山对日、俄、德的判断是正确的。如上所述,日本曾经向清政府提供武器,支援清政府镇压革命,也曾试图出兵或武力干涉。德国也从军事上支援清政府,俄国在政治上采取了与日本相同的政策。但是,孙中山认为威胁最大、最应提高警惕的是日本。武昌起义以来日本的对策证明了孙中山上述判断的正确性。为此,孙中山在欧美进行外交活动的一大目的,即利用欧美各国提前牵制日本的出兵与武力干涉。为直接阻止日本出兵干涉,在美国他提出渡日的愿望来鼓舞革命军士气。孙中山公然渡日的要求遭到日本政府拒绝后,他断然赴欧,利用英国与日本的同盟关系牵制日本,利用法俄同盟关系牵制俄、日。孙中山的上述外交策略从当时的国家关系看是正确的。英法两国主观上没有应孙中山要求牵制日本,但是他们在分析了东亚国际关系之后,已经自主地实行了对日牵制政策,因此,客观上与孙中山是一致的。这样,欧

美列强与孙中山虽然目的不同,但都自始至终牵制日本出兵干涉辛亥革命,日本最终也没能实现它的野心,这是辛亥革命外交活动的一大成功。

可是,对日本警惕心极强的孙中山回国后,却开始转而对日本有所期待。其中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1)与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等民间人士接触后,得知日本不能出兵干涉的情况,其对日认识与判断开始转化。(2)没有得到欧美的任何支援,于是不得不依赖于日本。这两个原因中,前者为前提,后者为客观环境。

最终发生上述转变的是因为在国内指导军队与朝廷官兵进行战斗的黄兴。辛亥革命并未提出反帝口号,但革命是从反对利用外国借款实行铁道国有化的保护运动开始的,所以在辛亥革命初期,要求列强采取中立、不干涉的态度。但是此时并没有依赖列强、获取列强支援的愿望。开始转向期待日本支援的事件是11月末汉阳革命军的溃败。黄兴认为,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1)德国对清政府官兵的军事支援,(2)革命军武器的落后。所以他通过参加了这次战斗的大陆浪人与日本现役、预备役军人,提出希望得到日本援助的愿望。黄兴劝说回国不久的孙中山接近日本,促使了孙中山对日态度的转变。

孙中山与黄兴的这种态度的转变是策略性的转变,而对日本的根本认识并未发生任何改变。但是这个转变对南京临时政府对日外交以及日本对革命政权的政策,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对外承认列强与清政府缔结的既成条约的有效性以及列强在华的既得利益。这与临时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理想是背道而驰的,但是为了革命能够取得成功,为了排除列强的干涉,获得他们对新政权的承认,不得不做出上述让步。这种对外政策从革命理想与原则来看应加以批判,但从当时的力量对比来看,可以说是适当的。通过该政策排除了对革命成功有可能造成最大威胁的日本以及其他列强的武力干涉。这是应当给予积极评价的。

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的外交课题是获得日本与欧美列强的承认。它不是对国家的承认,而是对新政权的承认。这是因为在辛亥革

命中,新旧政权发生交替,而中国在国际法上的主体资格并没发生任何变化。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对日本寄予了厚望,希望得到日本的率先承认,其中有种种原因。按照国际法承认新政权或新国家需要的几个条件:第一,新政权是否具有遵守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的意识与能力。如上所述,南京临时政府已经显示出了这个意识与能力,所以具备这个条件。第二是有效统制原则。即是否能在其领土内确立实际的统治权,有效行使其行政权并承担国际法规定的国家权利与义务。南京政府主要在南方具备上述诸条件,而北方清政府依然存在,南京政府的统治权没有达到北方。从这个条件而言,得到列强承认还为时尚早。第三,政权的稳定性。新政权不但其内部仍不稳定,而且经过南北议和,向北方做出妥协,并且准备将孙中山的大总统位子让给袁世凯,所以政权本身的承续也是不稳定的。故这个条件也并未完全具备。这三个条件,是从国际法的角度进行分析的。而比这更重要的是,政治上欧美列强已经寄希望于袁世凯,希望他能够统一南北方,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所以他们对孙中山的政权不给予承认。日本虽对袁世凯存有疑心,并不希望他君临中国,但是它又不认为孙中山是一个能够统一、统治中国的强人。再加上受欧美列强协调外交的牵制,所以它并不想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基于上述诸条件及原因,日本与欧美列强没有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南京临时政府也最终没能得到他们的承认。这是后来南京临时政府被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取代的一个外交原因。

日本的民间人士及舆论,都支持南京临时政府,并要求日本政府对其予以承认。但这并未变为政府的方针,只是个人或团体的主张,而且也没有形成主流,在日本政府、军部与南京临时政府之间仅仅起到了非正式的桥梁作用。

南京临时政府与孙中山对日本的第二个期待是提供武器和借款。孙中山为武力北伐、打倒清政府,组织了数十万人的军队。要维持军队、新政权、购买武器,更需要巨额资金。为此,尽管在国内想尽种种办法,其大部分仍然不得不依赖日本借款。借款的主要目的是从日本购入大量武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武器与借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这个问题上主动的一方是孙中山、黄兴与南京临时政府。他们

为获取借款,以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抵押苏省铁道公司与招商局、租借满洲、创设中日合办的中央银行等条件向日本提出六千万日元左右的借款,但是最终仅得到六七百万日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中方企业股东的抵抗与反对。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它是为了中国资产阶级近代企业的发展而开展的。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为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而向日本借款,相反却遭到了资本家的抵抗与反对。据此,两者的矛盾与对立激化。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借款问题上,在抵制日货问题上也时有发生。因此,可以说孙中山是在同“资产阶级”产生对立的同时向前推进资产阶级革命的。为何会发生这种异常现象呢?股东为何抵制、反对借款呢?第一,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冲突。借款首先用于购买武器等非生产性政治目的,并非用于企业发展所必需的再生产投入,所以作为企业在经济上不仅完全处于不利境地,其一部分经营也会为日本所掌握。因此,企业从眼前利益出发,反对借款。相反,为解决目前紧急问题,夺取最后的胜利,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认识到,必须牺牲目前利益,甚至不得不牺牲部分国家主权来获得借款。这即所谓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冲突。第二,这些企业虽为近代企业,但是仍然残留了一些前近代的因素。特别是在政治上,那些股东是非常保守的。因此,他们不但没有牺牲自己的暂时利益以成全革命的政治自觉,反而有不少人反感共和政治,倒向君主立宪和袁世凯。这说明革命与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之基础是非常薄弱的。第三,近代中国特别是日清、日俄战争后,因日本采取激进态度,对中国发动了侵略,中国人在总体上是反日的,这成为中国社会与历史的潮流。在某种意义上说,孙中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孙中山想利用受日本侵略的清政府与日本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借日本的力量来打倒自己的政敌清朝政府。他的革命战略与中国社会的历史潮流在表面上是严重对立的。因此,那些股东作为中国社会的一员,出于对日本的反感而反对借款。这样,国内阶级基础的薄弱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孙中山的对外依赖性。第四,日方在借款合同上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绝非平等互惠。因此,受到了股东的强烈抵制。股东们此举从反日这一点上应给予肯定,从企业的经济运营角度来看也是合理的。但是没有筹得这笔借款,